

清代的汉族移民与蒙古族农业探讨

陈文胜，李现臣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在历史上蒙古族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其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蒙古族农业兴盛于清代，而且从开发到耕地分布的基本定局，又完成于清代前中期，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的，而汉族移民自清代大量涌入无疑是其最深刻原因之一。

关键词：清代；汉族移民；蒙古农业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历史上蒙古族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在清代以前，除零星地区有一些耕作技术很低的农业生产外，基本上仍保持单一的游牧经济。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绝大部分地区仍是一片完好的天然牧场。由于清朝统治者民族隔离和禁垦政策，汉民经营的种植业一直限制在较小的局部地区，除了内蒙部分地区之外，还没有可称为社会经济独立部门的农业^[1]。其后，由于清廷治边政策的转变，大批汉民不断涌入，内蒙古开始出现一些较为稳定的农业区或半农半牧区。蒙古族人民不仅初步掌握了耕种耕耨的农业技术，而且蒙古族农民也占总人口的多数了。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蒙古族经济中终于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农业经济和农民阶级。这是三百年间的内蒙古社会中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改变了蒙古族长期以来只有单一畜牧业的经济结构，改变了历史上农产品完全依赖中原地区的状况。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从而使内蒙古逐渐发展成为多种经济地区。这对于蒙古民族的发展和蒙古地区各民族相互关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

《北史·室韦传》记载了蒙兀室韦务农的情况：“颇有粟、麦及稷 气候多寒，田收甚薄。”这既说明蒙古族农业古老的历史，又是说明其农业技术当时落后的情形。

据史料记载，内蒙古南部早在秦汉时代已有汉人屯垦，降至北魏及隋、唐时代，虽时断时续，但亦曾实行相当大规模的开垦。到了明代，据传内蒙古喀喇沁、土默特地方的开垦情况，已近似明朝的内地。《明史纪事本末》、《皇明实录》等载，俺答汗时，南蒙古西部蒙人已开始筑屋盖房并种植庄稼，与汉人杂居。清太祖一再入侵明边，掳掠人口，带到兴京附近充当奴隶，使耕种大酋长的田庄。根据这些史实可以设想，口外或边外的蒙古地区，也已经有了移民或俘虏从事耕种了。这正说明农业的出现，使蒙古封建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剥削方式有了变化。蒙古族统治者不杀俘虏，使其变为农奴，田地封建私有制出现了。俺答汗受此制度的影响也开始反对破坏农田以之放牧的办法而提倡“垦水田”以耕作。

明朝嘉靖时期，汉民涌入内蒙古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土默川地区“宣大之间房错而耕牧如棋布也”。^[2]荒芜了多年的古丰州又呈繁荣，出现了“人言塞上苦，侬言塞上乐。……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耨朝复暮，柴门鸡犬皆相依”^[3]的局面。此时蒙古地区明显地分划出农业区，牧业区及半农半牧区三种经济区域。其农业在经济上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此时的汉民入居内蒙古总体上来说，一方面是明朝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深，沿边军民不堪压迫，只好出塞谋生；另一方面，由于明朝长期实行与蒙古隔绝的政

策，蒙古地区农产品、手工业品产品奇缺，汉人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畜牧业经济的天然缺陷是它所出产的生活资料为动物性食品，品种单一且不宜贮存。而农业所出产的粮食营养丰富，而且易于保存贮藏，这也是游牧民族能接纳汉民移入的原因之一。

关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经济上的依存关系问题，札奇斯钦氏曾做过总体性的考察。他认为，从生产成本上说，游牧民族受其自然环境限制，人口稀少，劳动力严重不足，而且他们没有经营农业的经验和技能，在如此困难条件下从事农业，还不如牧养牲畜，从事狩猎收益大，他们自己不能生产农产品，就只能更加依赖于周围的农耕经济社会。^[4]正是这种经济需求，使蒙古贵族能够接纳、安置这些汉人。这是历代汉人入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二

随着大规模汉人的移入，蒙古农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历代。而这种发展与清朝统治阶级治蒙政策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在清代前期，总体上看，蒙古族人民中还是从事少量土地上的粗种和农耕，即所谓“漫撒子”。如方式济描述康熙年间蒙古族农业生产所说：“蒙古耕种，岁易其地，待雨乃播”，“布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计民田一半”。^[5]康熙三十三年时一段描述是：“即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耕耨之术，皆所不讲，谓之靠天田。”^[6]因此在这一时期里，耕地面积很小，农业人口不多，收获了了。农业在蒙古族整个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许多地区仍处于以副业为主的状态。这种状况与清初统治者害怕蒙汉接触，“将来俱为蒙古矣”^[7]，而采取的耕禁政策有关。

随着农业的开发，内地破产的汉族农民陆续流入内蒙古的也日益增多，从而蒙汉农民在生产和生活的联系中，相互交往与合作的关系日趋广泛。这种现象当然都是根本违背了清朝统治者奉行的民族隔离政策。而当清朝统治者看到汉民的流入和从事耕作有利可图的时候，清王朝则发令鼓励，放宽约束。如康熙皇帝曾谕准：“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8]一旦发觉被统治的民族将由此得以强盛或趋于合作会危及到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时，则立即反手加以禁之。雍正时看到蒙汉各族人民安居相处，一起事农，就深以为患，便提出：“民人（汉人）、蒙古杂居一处，亦属无益”^[9]，“恐滋事端”^[10]，复令禁止察哈尔地方的招民开垦。到乾隆十四年，清政府严令禁垦。禁令宣布：“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等旗以及察哈尔八旗，嗣后将客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者禁止。”^[11]清政府在禁垦理由上，也讲过：“若仍令招民垦种，有碍牧业，致妨蒙古生计。”^[12]这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官面文章，因为其根本策略是削弱蒙古族的势力，分化蒙古族的统一，保持蒙古社会的封闭、隔绝和经济上单一的原始游牧的落后状态，从而达到便于控制和防止蒙古族兴盛起来的目的。

事实上，清朝的禁垦并未禁止住内地汉民的继续涌入。农田被垦数目仍在不断发展，蒙古族从事农业的日益增多，这为蒙古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间，清朝出于对军粮近补给的需要，还是提倡在蒙古发展农业。同时，为了缓和内地农村不断扩大的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得不允许各地汉民流入内蒙古，采取一种“借地养民”措施。当时由于内蒙已开垦地尚少，蒙古族人民对农产品也有迫切需要，因而还是乐于习事农耕和招募汉族农民来内蒙开垦。如“康熙年间，喀喇沁旗呈请内地民人前往种地”。一些蒙古王公，也“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3]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就曾告谕乌珠穆沁亲王：“此耕种关系蒙古诸人生计”，“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取米，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至腾贵也。”^[14]这当然都是一些笼络之言，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统治，但总体上还是反映了当时在内蒙古发展农业的社会要求。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汉民入居内蒙古谋生的为数日

多。

顺治、康熙时，内蒙古东部各旗已建立粮仓，如果没有一定的农业，这些措施的实行是不可能的。范昭逵在其所著“纪行内”说：“近来已有屯田处，也解青稞南亩耘”，^[15]说明了垦种的程度。而乾隆时仅内蒙古喀喇沁地方，“容外来民人”就已多至数万。热河地方“山厂平原，尽行开放”。至嘉庆七年，郭尔罗斯耕地面积已达广二三十里，纵百八十里。嘉庆帝甚至说：“私自招垦者，虽与秦明者有间，但已招垦于前，亦不得于垦熟之后，借词逐胁。”^[16]表明了其对待垦蒙汉民的态度。到十九世纪初，内蒙古东南部已完成了“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局面。^[17]乾隆“尚有开垦之地”到道光中，“山巅水涯，殆无旷土”，到光绪三十一年前后，已开垦了十之七的地区。^[18]此时的内蒙古已形成了广大的农业和半农半牧区。像喀喇沁、土默特、归化城等地方的蒙古族人民，不仅初步掌握了耕种耘耨的农业技术，而且蒙古族农民也占当地蒙古族人口的多数了。象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伊克昭盟、土默特旗以及呼伦贝尔南部，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左翼三旗，郭尔罗斯二旗，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部落、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三旗（特别是后套地区）等地耕地面积已有了相当规模，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已经建立起来。

三

在清代的汉族移民的垦殖下，蒙古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见之于诗咏：“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乃刈获……而今则不然，均匀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之农虑，”^[19]说明了农耕技术的提高。

在汉族移民的影响下，蒙古农民掌握了深翻、耙磨、耩播、施肥、开畦、培垄、锄草、间苗、浇水等全套农活，并注意选种、倒茬、节令雨量；同时蒙古过去所没有的粮食作物、瓜果、蔬菜之类也被汉民带入蒙古。更重要的变化是牧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地方“农重于牧，操作如汉人了”。^[20]由于农业的发展，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土地私有制得到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租佃，通过租佃，旧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清代统治者企图极力保持的封建领主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封建主对牧民的人身束缚正在削弱。这对蒙古族农业经济生产力的解放无疑具有客观的进步意义。

当然在我们看到汉族移民对蒙古地区游牧业产生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也应从生态环境角度来看待清末时其过度移民垦殖对蒙古农业产生的消极影响。光绪二十八年，清王朝废止了过去的“边禁”政策，正式开放蒙荒，并改私垦为官垦。清廷在内蒙古这一所谓“新政”，敞开了内地汉民涌入草原的门户。汉民开始在察哈尔、乌兰察布、昭乌达、哲里木等地区大批移居，在1902至1908年的所谓“移民实边”的高潮中，内蒙西部共放垦757万亩，东部地区放垦土地2450万亩。^[21]许多生态脆弱带，如“阴山北麓、丘陵伏沙地区”为例，该区是“敕勒歌”诞生地，上世纪“草过于马脊”的优质草原，由于过度垦植，到了近代，生态恶化已十分严重。再如鄂尔多斯、康熙亲征噶尔丹时还是“生计周全、牲畜茂盛、较其它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等皆甚相宜”，到抗日爆发前夕，变成“生计不周全，牲畜不茂盛，较其他蒙古贫穷”的地方了。^[22]过度垦植的后果是草原区域面积减少，沙漠化严重。内蒙古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长期协调发展的结果。农耕、游牧民族持有截然不同的经济价值实现方式。游牧民族文化是一种顺应生态规律和特征的文化形态，表达的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认知观念和群体的价值取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态文化。这一点与农耕民族是不同的。因为农民对自然（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有着固定的范围，其中技术手段起着关键作用，这样同游牧文化相比，其对自然的改造大于对自然的适应。

有的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汉民垦植，认为封闭式的游牧文明只能维持较原始的生存模式。其社会一旦进入更开放、发展的时代，尤其是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保持那种田园牧歌式生活，精神状态宁静自足，这是低水平经济文化的反映。^[23]但长此，差距拉大、短期宁

静将会将被失落与落后取代。所以，这时从内地获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补充，对于游牧民族是必要的。正是如此，汉族移民垦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而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消极一面是次要的。

我们认为，从现实层次上，农牧文化相互交织、渗透、聚合，有利于整个中国多元一体结构特色的形成，两种生产方式、文明的对接、碰撞、互动，有利于拓宽各自的文化内涵，刺激各自的发展，但如果象清末“新政”那样，在牧区过度垦植，则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如果只从人类自身的短期利益，尤其是从生活的安乐舒适来看，游牧的生活方式确实是不适宜的。但是从生态平衡以及人类生存的长远意义着想，游牧生产方式有着积极科学的依据，其在历史上对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维持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正确看待清代以来汉族移民垦植与蒙古农业发展时应持有的全面的正确观点。

总之，清代汉族农民大批迁入内蒙古地区后，与蒙古族人民相聚而居，朝夕相处，通过互相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不仅对牧业经济起了良好的调剂和促进作用，而且对促进内蒙古的手工业以及整个游牧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汪炳明. 清末新政与北部边疆开发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 [A].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
- [2] 王世贞. 北虏始志 [M]. 中州史料前集万历刻本.
- [3] 方逢时. 大隐楼集 [M]. 卷三, 潜江甘氏刻本.
- [4] 中亚研究 [Z]. 汉堡, 1977.
- [5] 龙沙纪略 [Z]. 饮食 [A].
- [6] 热河志卷十五 [A].
- [7] 清圣祖实录 [Z].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壬寅.
- [8] 清圣祖实录 [Z].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己亥.
- [9] 清世宗实录 [Z]. 雍正八年九月乙未.
- [10] [11] 大清会典事例 [Z]. 卷九七八、九十七.
- [12] 大清会典事例 [Z]. 卷一六七.
- [13] 清圣祖实录 [Z]. 康熙三十年七月丙午.
- [14] 清圣祖实录 [Z]. 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丁巳.
- [15] 范昭远, 纪行内. 从西纪略 [Z].
- [16] 睿宗圣训 [M]. 卷一〇八.
- [17] 仁宗嘉庆实录 [Z]. 卷二二九.
- [18] 姚锡光. 筹蒙改良刍议 [M]. 卷六: 实边条议 [A].
- [19] 热河志 [Z]. 藩卫 [A].
- [20] 东三省政略 [M]. 蒙务记实业 [A].

[21] 布赫主编. 内蒙古大词典[Z].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22] 达丽. 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3] 费孝通. 民族研究文集[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452.

A Discussion of the Han immigration into Mongolia and the Agriculture of Mongolia

Chen Wen-sheng , Li Xian-chen

(Academy of Mongology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Mongolia was once a nationality of leading a nomad's life on history relying on a life style of livestock bree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agriculture has experienced a long and winding way . It's agriculture began to flourish in Qing Dynasty. Furthermore, It had been finished development before the early middle time of Qing Dynasty, from the open up to essential settlement of cultivated fields dispersed . This condition had it's deep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reason , but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into Mongolia from Qing Dynasty was one of it's fundamental reasons .

Key Words: Qing Dynasty ; Han immigration ; Agriculture of Mongolia

收稿日期: 2003-11-24;

作者简介: 陈文胜(1975-), 男, 汉族, 河南信阳人, 内蒙古大学蒙学院近现代史所硕士研究生。

李现臣(1969-), 男, 汉族, 河南濮阳人, 内蒙古大学蒙学院古代史所硕士研究生。